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五)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六六期 ——
(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7 c)

【研究报告】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

自杀情况的初步考察

谢 泳

邓拓之死——文革期间自杀现象研究

胡 平

【史海钩沉】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对邓拓夫人丁一岚的访谈

任 捷

伴君如伴虎——毛泽东是怎样把邓拓逼入绝路

胡绩伟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研究报告】

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情况的初步考察

• 谢 泳 •

本文拟初步考察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情况，这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的数量是惊人的，尤其集中于1957—1967年前后约十年之间，而这十年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原因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比如湖南省道县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间，被迫自杀的人数即达三百二十六人，文革期间，零陵地区自杀人数就有一千三百九十七人（“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转引自“大时代文摘”1997年7月10日8版，广州），也可以说这两次政治运动是导致知识分子自杀数量急剧上升的直接原因。由于中国有关的档案尚未完全解密，有关这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的人数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所以我只能根据有关的回忆和少量的访谈及调查选取一部份知识分子的自杀情况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需要说明的是1949—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中多数是不知名的，但由于这部份资料极难收集，所以本文据以分析的知识分子自杀资料基本上局限于著名的知识分子，这包括如下几类人物：一、作家；二、学者；三、名演员；四、科学家，以下是四十位受迫害自杀的著名知识分子名单：

姓名	生年	毕业大学	留学国家	单位	年龄	自杀方式	年份
翦伯赞	1 8 9 8	武昌商专	美国	北京大学	7 0	未详	6 8
傅 雷	1 9 0 8	上海持志	法国	上海文联	5 8	上吊	6 6
老 舍	1 8 9 9	北京师范	英国	北京文联	6 7	跳湖	6 6
储安平	1 9 0 9	光华大学	英国	九三学社	5 7	跳河	6 6
李广田	1 9 0 6	北京大学		云南大学	6 2	跳池	6 8
陈梦家	1 9 1 1	燕京大学	美国	中科院考古所	5 5	上吊	6 6
邓 拓	1 9 1 2	光华大学		北京市委	5 4	上吊	6 6
范长江	1 9 0 9	北京大学		新华社	6 1	跳井	7 0
许政扬	1 9 2 6	燕京大学		南开大学	4 1	跳河	6 7
汪钱竹	1 9 1 6	西南联大		北京大学	5 0	不详	6 6
赵宗复	1 9 1 5	燕京大学		太原工大	5 1	跳楼	6 6
姚 溱	1 9 2 1	大同大学		中宣部	4 5	自缢	6 6
李平心	1 9 0 7	上海大学		华东师大	5 9	不详	6 6
杨 刚	1 9 0 5	燕京大学	美国	人民日报	5 2	自缢	5 7
闻 捷	1 9 2 3			上海作协	4 8	煤气	7 1
田家英	1 9 2 2			中央办公厅	4 4	上吊	6 6
张宗燧	1 9 1 5	西南联大		中科院物理所	5 2	自缢	6 9
张宗颖	1 9 1 7	西南联大		中科院社会所	4 0	自缢	5 7
陈笑雨	1 9 1 7			人民日报	4 9	跳河	6 6
饶毓泰	1 8 9 1	中国公学	美国	南开大学	7 7	自缢	6 8
谢家荣	1 8 9 8		美国	中科院地质所	6 0	不详	6 6
卢作孚	1 8 9 3			四川政协	6 9	不详	5 2
言慧珠	1 9 1 9			上海戏校	4 7	自缢	6 6
上官云珠	1 9 2 0			上影	4 8	跳楼	6 8
叶以群	1 9 2 0		日本	上海文联	5 5	跳楼	6 6
吴 晗	1 9 0 9	清华大学		北京市委	6 0	不详	6 9
杨 朔	1 9 1 3			全国总工会	5 5	不详	6 8
刘盼遂	1 8 9 6	山西大学		北师大	7 0	不详	6 6
田羽翔	1 9 0 0	北京大学		山西大学	5 7	上吊	5 7
王重民	1 9 0 3			北京图书馆	7 3	自缢	7 5
顾而已	1 9 1 5			上影	5 5	自缢	7 0
刘绶松	1 9 1 2	西南联大		武汉大学	5 7	自缢	6 9
陈 珪	1 9 1 9	西南联大		华东局宣传部	4 8	跳楼	6 7
张若名	1 9 0 2	天津女师	法国	云南大学	5 6	投河	5 8
方书春	1 9 1 6	中山大学	美国	北京大学	4 1	自缢	5 7
罗广斌	1 9 2 4	西南联大		四川文联	4 3	跳楼	6 7
周 文	1 9 0 7			中央党校	4 5	不详	5 2
周瘦鹃	1 8 9 4			苏州博物馆	7 4	跳井	6 8
冯大海	1 9 2 7	北京大学		中国作协	4 0	跳河	6 7
孟秋江	1 9 1 0			天津统战部	5 7	不详	6 7

除此之外，为了更进一步反映这期间自杀的知识分子情况，我再引述一部份文献中提到的自杀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由于不很知名，所以有关详情一时难以查考。

一、“田保生是我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 1 9 5 7 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严重的冲击，1 9 6 6 年 8 月 2 8 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与夫人双双含冤而死。”（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 2

02—20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4月）

二、“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着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有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家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当年反右很起劲的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此时却成为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只是他此刻的支持起不了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他本人也自顾不暇，不久就跳楼自杀了。”（朱正“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斗争”，《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三、“李克俊，是总编室的一个职工，…1955年6月下旬出版社迁景山东街之后不到十天，他自杀了，据说是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胡风问题吧。…刘佛谛，上通县师范，他是第十班，我是第十二班，…他于1969年初寻了短见，…喝敌敌畏，中毒而死…”（张中行“流年碎影”401—5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

四、“声讨刘宾雁的右派罪行——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以跳楼表演了”士为知己者死“为开端…”（从维熙“走向混沌”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年5月）

五、“早在十年动乱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牺牲者了。例如著名的电影导演史东山，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周文，以及新闻工作者洛蔚，招麦汉等，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黄秋耘“风雨年华”1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5月）

六、“朱学逵是北大中文系的优秀的毕业生…。他趁人们都去午餐，五楼上仅有看管他的一位女同志在，他借口请假上厕所，立即将新婚爱人送的手表从腕上取下放在窗台上，自己迅即从五楼跳下去…”（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399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6月）

七、“海燕书店的老板俞鸿模（他出版过许多七月派诗文）是自杀的”（黄成勇，“博览群书”1997年第2期，北京：光明日报社）

八、“说起这事还要提到我的早已去世的老友郑伯彬。他和徐盈在1957年遭受同样的命运。徐的回答据说是一言不发，郑的回答是九年后，1966年，自己结束了生命。”（金克木“徐盈的未刊小说”，“文汇报读书周报”1997年3月22日3版，上海：文汇报社）

九、“父亲在遭受了一帮军内造反派的一顿毒打后，一个人狼狈不堪地回到家里。…进门后，他一头冲进厕所里，好半天没有开门。开门后，我的妹妹闻到了一股敌敌畏的味道。…他一个人走了。”（艾晓明“血统”351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4月）

十、“1967年夏天，母亲写信告诉我，说梅萍自杀了。”（郑念著，苏帆译“上海生死劫”，北京：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

十一、“北师大围剿‘五一六’之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这是钱瑗一生中所受最大打击。”（章廷桦“同窗钱瑗”，“文汇报读书周报”1997年9月6日，上海文汇报社）

十二、另外据笔者的调查，北京大学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颜毓衡，杨佩铭，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李绂、罗绮夫妇都是在反右和文革前后自杀的。（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宁宗一教授，武汉大学逢彬，中国作协陈丹晨先生给笔者的信。）

◇ 分析

爱米尔·杜尔凯姆 (Emile durkheim) 曾对自杀现象做过系统的研究，他从对宗教活动、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体的研究中，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即利己型 (egoistic)，这种类型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没有同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 (altruistic)，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而贡献自己的生命；第三种为动乱型 (anomic)，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实现受到了社会的制约。杜尔凯姆将自杀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因素的思路，给人们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自杀和社会环境有关，正是从自杀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某个人自杀的根源和背景。（爱米尔·杜尔凯姆“自杀论”，中译本128，174，20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1949—1976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状况，恰好能从它们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找出根源。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和杜尔凯姆的研究是不相吻合的，或者说杜尔凯姆作为社会学家，他所描述的是常态社会中自杀现象的一般规律，而我在本文中所考察的是一个非常态社会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奇异现象，在这种现象面前，杜尔凯姆有关自杀的理论，常常难以说明整体状况，而只在具体到某一自杀的个体时，才显示出它的意义。比如在1949—1976年间集中自杀的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处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般的紧张和冲突，而是这个环境从根本上出现了有意识地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压力，这种压力在1957年1966年达到了高峰，知识分子自杀情况和这两个年头发生的政治运动完全成正比例。这就是说，这期间出现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完全带有突发性和传染性，个别自杀者的结局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示某种暗示性，使许多面临同样压力的知识分子能在恐惧中感到那种结局也是适宜于自己的。比如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自杀后，仅过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于9月6日也自杀死去，又隔了三天，9月9日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李翠贞与傅雷生前是好友。（陈丹晨“在历史的边缘”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8月）

从1949—1976年间知识分子自杀的人数上看，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有这么多知识分子选择自杀的道路是令人吃惊的。西方国家和亚洲的日本作家自杀的情况比较为人熟知，但在三十年的时间内（仅以我上表所列的四十位知名知识分子而言）有如此多的知识分子自杀，也是惊人的。有研究表明，西方和日本作家有自杀的情况，而中国作家自杀的传统是不常见的。陈丹晨在一篇比较中西作家自杀现象的文章中认为：“在古代历史上，这种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专制迫害等等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诗人作家处境十分艰难，一般却并不选择自尽方法，而寻找了另一出路”（陈丹晨“在历史的边缘”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8月）。陈丹晨认为这与中国文人的生死观有关。“中国传统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问题上有一点绝对相似的是重生轻死”（陈丹晨“在历史的边缘”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8月）。可见中国作家本无自杀的传统，但为什么到了某一历史时期却集中出现一个自杀的高峰呢？这个原因只能从那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

这一时期除了政治上的高压之外，对知识分子而言，生存的空间是极其狭窄的

，在这时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处境既不同于帝俄时代的流放，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谪贬。在那样的时代里，在皇权之外还有民间社会，被正统贬斥，并不意味着在民间无法生存。而1949—1976年间，民间社会的根本消失，使一个知识分子在受到政治迫害之后，根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知识分子是以传播思想文化为职业的，但1949年后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权利完全消失了，这些权利消失，使知识分子只能依赖体制生存，而一旦被体制排斥，他们只能去从事体力劳动，而对知识分子来说失去了以上两种自由，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数知识分子受迫害后的绝望也是由此而生的。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是导致这一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急剧上升的根本原因。另外，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处理方式通常是两种，一种是将其下放到最为贫困的地区，另一种是将其遣返回乡。改变生存条件是在肉体和物质上折磨知识分子，因为常年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人，突然改变生存环境，并不是精神上能否承受的问题，而是生活习惯就无法忍受，当年大批出生在江南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北中国的新疆、青海、山西、东三省最偏僻的乡间，使多数知识分子在身体上受到极大摧残。遣返故乡的打击则是双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成名的知识分子，多从中国乡间来，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但当时对知识分子的遣返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却选择了赶回老家去的办法，让一个好不容易才从乡间挣扎出去的读书人，（他们多数出生在富有家庭，回到农村，回到贫下中农面前）戴上右派、历史反革命、特嫌、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回到从小生长的环境里，让故乡的前辈、亲戚、孩提时代的朋友，都认识自己的罪行，这对一向爱面子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打击是很严酷的，在1949年后的时间中，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无形中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时的最终出路产生了影响。

从上表所统计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已知的自杀时间中，除了卢作孚、周文自杀于1952年外，剩下的三十八人全部都自杀在1957和1966年前后，这个知识分子的自杀时间和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的文革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这两次运动的实质。

我曾按如下的思路对自杀者情况进行过调查：

- 1.自杀的具体时间、地点。
- 2.自杀的方式（跳河、楼、烟囱、海、井、粪坑；自缢；打开煤气；服过量安眠药；触电；切断动脉；卧轨等等）。
- 3.自杀的直接动机。
- 4.自杀时所在的具体单位。
- 5.自杀时的经济状况（主要指收入）。
- 6.自杀前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疾病）。
- 7.自杀时的婚姻状况（主要指是否与配偶不和）。
- 8.自杀时与子女的关系。
- 9.自杀时的具体年龄。
- 10.自杀后单位的结论。
- 11.自杀者家族有无自杀病历。
- 12.其他特殊情况。

分析以后我们会发现如下特征：

一、自杀方式中，以最简单，但也自杀率较高的方式如跳楼、上吊为基本方式，这个方式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在选择自杀时的绝望程度。从一般自杀方式看，中国知识分子选择的方式受制于物质条件的制约，如在已知的四十位自杀者中，只有诗人闻捷是选择打开煤气的方式，因为他生活在上海，其他自杀者多选择自缢和跳楼，这要忍受更大的痛苦，这种自杀方式的单一化，正反映了自杀者唯有一死的心理

。

二、自杀者的年龄中，除老舍六十七岁，饶毓泰七十七岁，卢作孚六十九岁，王重民七十三岁，周瘦鹃七十四岁外，其余三十五人，年龄约在四十五至五十五岁之间，尤以五十岁左右为高峰。这个自杀者的年龄告诉人们，在1949—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中，以年富力强，正在事业高峰期的中年人为主，这个年龄通常是一个社会成员生活是否正常的主要指标，所以年龄段自杀者集中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巨大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

三、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这些自杀者分布的单位也很集中，以高等院校、作协文联、艺术团体为主。这个职业特点符合反右和文革的直接指向。

四、在这四十名自杀者中，有张宗燧、饶毓泰，谢家荣三位学部委员，其中饶、谢还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

五、这些自杀者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夫妻双方自杀现象，计有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吴晗夫妇、闻捷夫妇、刘盼遂夫妇、刘绶松夫妇、杨嘉仁夫妇、田保生夫妇、李绂夫妇等。婚姻状况是研究自杀时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都认为婚姻状况的恶化是导致自杀现象增多的一个原因。但我们特别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中夫妇同时自杀的现象恰好表明，这一时期的自杀人数激增完全是由于外在的社会压力而致，与自杀者的性格、年龄、经济、婚姻的良好状态都不足以缓解自杀者的压力，这从反面证明当时社会的恐怖程度。

六、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情况与1957年和1966年间政治运动对个人人格侮辱有关。这一点在有些人身上甚至超过了政治迫害，比如当年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就是在被人当面扇了耳光之后自杀的，其他诸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晗等等都有类似的情况，由此可见由政治迫害而导致的人格侮辱是许多知识分子自杀的直接原因。

◇ 简短的结论

一、1949—1976年间，中国出现了大批知识分子自杀的现象是人类的耻辱，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时期其他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

二、知识分子大量自杀的情况，作为个体可能有其特殊的原因，但就整体看，大量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发生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必然带来的结果，我在前表所列的四十名自杀者中，没有一例有家族自杀病史的，可见自杀现象的大量发生和个体的生活状况没有直接关系。

三、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奇异的自杀高峰，从反面证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确实具有改变传统的能力。

四、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集中出现，说明那一时期民间社会的彻底消失，也证明了人们生存权利根本没有保障。

五、自杀现象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会在很短时间内消失。

□ 原载《教育在清华》，野百合丛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 ∞ ∞ ∞ ∞ ∞ ∞ ∞ ∞ ∞

邓拓之死——文革期间自杀现象研究

• 胡 平 •

文化革命中自杀的人太多了，几乎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讲出几件自杀的事例。然而，直到文革后三十五年的今天，我们却还没有一个文革期间全国自杀人数的粗略统计，更不用说比较准确的数字了。也许，我们已经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一数据，中共当局长期压制对文革的调查研究，再一次造成有意识的遗忘，三十年的光阴足以使许许多多平凡人的故事湮没无闻。

文革期间，有很多人自杀。这本来不足为奇（！），因为在共产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很多人自杀，譬如在土改中有很多地主自杀，在镇反中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自杀，在三反五反中有很多资本家自杀，在反右中有很多知识分子自杀。文革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在文革中，除了有很多地主、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资本家、知识分子自杀之外，还有很多共产党的干部，包括一些位高权重的老革命、老干部自杀，还有很多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以及追随共产党并曾经得到共产党赏识重用的知识分子自杀（固然，在先前的政治运动里也发生过共产党干部或党内知识分子自杀的事例，但为数较少，通常也不被外人所知）。

在写于一九八六年的《罗总长蒙难纪实》一文里，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讲到：

“今年是老舍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我和许多读者一起读到了苏叔阳为纪念老舍先生逝世而写的剧本《太平湖》。当我试着以同样的方法去设想当年父亲在作出同样的举动的心情时，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不知道这是父亲和老舍先生之间的区别，还是事实和作者想象之间的区别。

过去我们把这种行为称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现在，我们当然不再使用这种概念了。但是，它是不是就是‘以死抗争’、‘以死来唤醒’，是不是让‘人们看见我的尸首，必会仔细地想象……这是为什么？这些个问题闷在人们的肚里，总有一天会吐出来，会响起一个闷雷，那时候，就会要你的好看’。还有：‘像我这么个人，不能白死。我得死个轰轰烈烈，得死出个响动来。’（《太平湖》中的老舍先生语）作为后来者，当然不妨这样去看待老舍先生和其他在那个黑暗年代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社会精英的死。但是假老舍先生之口说出这些话来，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妥。甚至还会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去冲淡这种死亡的真正残酷性。”

罗点点说得不错，苏叔阳假老舍之口讲出的那番话是不真实的，是不符合老舍自杀时的心理状态的。老舍自杀并不是想造成一种“响动”，并不是以死抗争，以死来唤醒民众。老舍是作家，是多产作家，他以文字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如果他真要以自杀这种最后的行为向世人传达某种信息，他不会不留下遗书。老舍是有时间、有机会写遗书的，因为在当时，老舍还没有被关进牛棚或监狱。据说，在8月24日那天出门的时候，老舍身上是带着纸和笔的，有人看到他在湖边呆呆地坐了很久。然而，我们知道，老舍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老舍自杀丝毫不“轰轰烈烈”，老舍是悄悄地、默默地离开人间的，直到他的尸体浮出太平湖面，人们才知道他的自杀。

如果说老舍由于没有留下遗书因而我们很难了解他自杀时的心理状态，那么，另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倒是在自杀前写下了遗书，从而为我们今天的研究与思考提供了珍贵的证词。我这里指的是邓拓。邓拓既是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又是一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文化革命以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为序曲，随即转入对“三家村”的口诛笔伐，作为“三家村”之首的邓拓顿时成了全国上下第一号批斗目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邓拓在家中自缢身亡，临死前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北京市委的，另一封是写给妻子丁一岚。

在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中，邓拓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接下来，邓拓用了不少篇幅，认真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与不足，竭力表白自己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例如，他解释道，《说大话的故事》原是听到当时有些农村又有买卖婚姻和谎报产量的现象，不是反对大跃进，攻击总路线，《一个鸡蛋的家当》原是有感于当时有些社队又在搞投机买卖和剥削行为而写的批评，不是“要纠集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我们的党”。邓拓说：……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在这封长长的遗书的最后部份，邓拓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正如李洪林指出的那样：“曾经写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邓拓，应该不是软弱之辈。再从他在《燕山夜话》中表现的清醒头脑和深刻见解看，他也决不会愚忠到如此地步，居然至死不悟。然而在遗书中他竟充满激情地高呼‘万岁’，实在使人感到悲哀。”（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P191，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

然而，更使人感到悲哀的是，邓拓的最后表现甚至连古代的愚忠都不如。所谓愚忠，是指对昏君暴君仍然坚持忠诚。但是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忠诚并不是无异议地支持君主的任何行为。恰恰相反，忠诚意味着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提意见，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如果君主震怒，忠臣绝不只是一味地表明自己的清白，反复申述自己决无反叛之意或背离之心，更重要的，是他绝不放弃自己的批评意见。在这里，忠臣绝不否认他和君主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始终坚持认为君主的某些主张或行为是错误的。

不妨以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海瑞为例。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疏，奏疏中指出，皇帝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系风捕影”。奏疏中最刺激的一句话是“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海瑞知道自己的批评可能招致皇帝的震怒和严厉的惩罚，他甚至叫家人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

这才叫忠臣。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忠臣意味着在恪守君臣分际，也就是承认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坚持给君主提出批评意见。问题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听不进你的逆耳忠言，反而还要对你打击迫害，你为什么还要承认他的权力，还要对他继续效忠呢？所以，

后人常常把这种忠诚称为“愚忠”。

根据上述对忠诚的解释以及由此引出的对愚忠的说明，我们不能不指出，象邓拓在遗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其实还算不上愚忠。假如说在写《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时候，邓拓确实是在冒着一定的风险用曲折隐晦的方式批评毛泽东，规劝毛泽东的话，那么，当他遭到党中央的批判，遭到毛泽东批判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的批评立场。邓拓不但否认他是“反革命”，而且还否认他和毛泽东之间存在意见分歧。邓拓在遗书里竭力缩小、以至于根本否认自己持有某种不同政见，竭力否认自己和党中央和毛主席有任何不一致。遇到实在无法否认这种分歧的地方，邓拓就承认是自己的认识不足，是自己有缺点有错误，而不是理直气壮地指出党的错误、领袖的错误，因此他表达的不是忠诚，而是顺从，是无异议的顺从。邓拓当然是受迫害而死的，但是，我们很难说他是为了坚持真理而死的。他坚持了哪一条真理呢？他不是把自己原来提出过的真理几乎都放弃、都否认了吗？这才是最可悲哀的啊！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共产极权制度和传统的专制制度的重大区别。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为臣者还多少有一点批评君主和发表异议的言论空间。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反对君主的错误不等于反对君主，相反，它可能还是忠于君主的表现。这个原则君主也是承认的。因为君主并非真理的化身，君主并非因其正确才成为君主的，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是来自天意，来自血统，或者乾脆来自打天下坐天下，不是来自绝对正确，君主并不等于正确路线代表。因此，批评君主的过错并不等于否认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于对君主的权力构成直接的挑战或威胁，皇帝错了也还是皇帝，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评，这就为批评君主留下一定的空间。我把古代的忠臣比作现代的“忠诚的反对派”，理由即在于此。只不过在古代，臣子批评君主并未确定为一种权利，因此是没有保障的。

共产极权专制却不同。在共产极权制度下，最高领袖的权力据说是来自于领袖的伟大正确，来自于他是真理的化身或曰正确路线的代表。因此，最高领袖就成为不可批评，因为对领袖的任何严肃的批评，都意味着对其权力合法性的挑战。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遭到威胁。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么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在中共党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正因为共产极权专制把权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能承认有任何别人比自己更正确，不能容忍任何批评反对的声音。一个人只要进入了这种体制、这套系统，或迟或早就会发现，在其中，个人再也无法坚持独立的声音——除非与之决裂。由于邓拓未能否定制度，结果只有否定自己。邓拓自杀是深刻的悲剧，但这里的悲，是悲惨，而非悲壮。读邓拓的遗书，你不能不痛感这么优秀的一个人竟然死得如此窝囊。

我否定了邓拓自杀具有真正的抗争意义，决不是否定邓拓的高尚品格与卓越才华。我只是要揭示出邓拓自杀的全部残酷性。

□ 《文化大革命三十五周年研讨会》发言，2001年7月14日

~~~~~

【史海钩沉】

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对邓拓夫人丁一岚的访谈

• 任 捷 •

虽然从没有见过丁一岚，可在电话里已经感受到她待人的谦和与友善。因为要

采制一个关于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节目，我打电话找到了丁一岚，讲明自己的采访意图，她答应我去她家里采访，她非常详尽地告知我乘车和骑自行车的线路，并且提出了三个时间供我选择。我选择了6月15日，碰巧1998年6月15日是《人民日报》成立50周年。在这样一个日子，在挂着邓拓遗像的书房里，听着丁一岚追忆往事，我好像总是感觉到墙上相框里的逝者俯视我们的目光。

《人民日报》也没有忘记邓拓这位总编辑，特别敬献了一只花篮。

也许是这个日子，也许是这些鲜花，丁一岚时不时因为哭泣而不得不中断谈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慰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我想，她心中的创痛，是我无法劝慰的。我只能默默地递上餐巾纸，默默地聆听，默默地等待她的平静。

第二天一大早，丁一岚就传呼我，我急忙回电话。她很客气地向我抱歉，说她昨天情不自禁，在采访过程中，哭了许多次，增加了我做录音访谈的难度。她说，她是很坚强的，很少在记者面前流泪。她担心自己由于情绪激动说了过激的话，对党造成不好的影响，让我好好地按一下关。说完这些，她放心地挂断电话。我仔细地听了她的全部谈话录音，那些浸透着泪水的历史，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铺展开来。

◇ “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

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浩劫最早的牺牲品就是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所写的知识性强、文笔生动、针砭时弊的文章，被称作是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的“一支支毒箭”。抛出“三家村”，成为引发文革的导火索。丁一岚对30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

从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的问题说起来，比“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要早一些，因为最初是有一个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那时还没有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然后，就是1965年开始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

当时，毛主席大讲海瑞，所以，有些领导人就示意吴晗写关于海瑞的剧本，吴晗接受了中央的要求写了《海瑞罢官》，但后来居然变成吴晗借此反党了，我们都觉得实在是有点冤屈吴晗。当时北京市委是想保护吴晗的，希望能把事情说清楚。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这上面挖，那时候，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人给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写专栏，题目叫“三家村札记”，最后把邓拓的《燕山夜话》也连上一块批判，这三个人就这样被捆在了一起，就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

1966年报上公开提出，没有人支持，他们三个人怎么敢于这样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背后还有人，得挖出来。大家也逐渐看清楚了，其实这“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而真正它的目标是后面的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后面又是彭真、少奇同志和周恩来总理，他们对于国家建设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批判“三家村”的矛头是对着刘、周，就是从“三家村”这条线转过来的。我们总还以为批判一段时间就结束了，我记得杨述（文革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北京市高教党委书记，韦君宜的丈夫）同志去看邓拓，邓拓说，嗨，好好检讨吧，有一年也就过去了。杨述还说，哎呀，我怕一年还结束不了，恐怕得两年三年。所以大家总还想着这是一段时间的理论斗争、政治斗争，然后结束了嘛，也就完了，最后，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有一个甄别平反，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批判后来发展到那么残酷，简直不讲任何道理，并且还引起全国的混乱以及武斗。

直到1966年初，中央点名批评北京市委对“三家村反党集团”是假批判、真包庇，邓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两位朋友在这场党内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

。早在1956、195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邓拓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扯进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斗争。丁一岚回忆——

#### ◇ 毛主席为什么批邓拓

当时邓拓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少奇同志要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既不要左倾盲动，也不要右倾保守。当然，按照少奇同志的意思，主要是以反左反冒进为主。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必须要经过总编辑发稿的，邓拓很明白，毛主席是不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所以夹在中间很为难。社论大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这么重要的社论都是要经过毛主席批准才发表的，毛主席批了个我不看了，这意思也很明显，就是不同意社论的观点。因为以前发社论同意不同意，毛主席看完以后都会发表意见。但他这次说我不看了，也不是说我不看了，你们就去发，不是这个意思。

面对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大样，邓拓陷入冥思苦想。

你说发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发吧，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那边又没法交代。邓拓本人也同意社论的观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发表这篇社论。可是，他毕竟还是书生气十足，原来社论是4号字，他改成了5号字，想着字小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特别醒目，引人注意，其实这无济于事。因为这件事，毛主席对邓拓很不满意，就批评他是：书生办报。“书生办报”是缘于这里。

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是从反右开始的。毛主席要钓大鱼，让《人民日报》刊登一些批评我们党和国家的比较尖锐的文章，不加任何按语就登出来。邓拓认为党的机关报这样登不妥，影响也不好，就还是在这些文章上加上了按语登出来。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那个钓大鱼的思想了，把阴谋阳谋稍微暴露了一些，所以，毛主席又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有了毛主席的这两句话，邓拓就没法再在《人民日报》干下去了。邓拓跟毛主席的路线和做法都跟不上，他也理解不了，最后连总编辑也给撤了，邓拓本人也要求辞职。有了这些历史上的原因，等到最后“三家村”的问题拉出来的时候，邓拓也觉得在劫难逃了。

#### ◇ 邓拓夫妇都凭良心讲过真话

邓拓带着毛主席的两句评语：“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离开了《人民日报》，回到北京市委。他终究还是一个文人，他离不开他所热爱的写作，他用杂文的形式，写一些对现实有针对性的文章，这些杂文很多是批评当时不实事求是的作风、缺乏民主的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像《一个鸡蛋的家当》、《“推事”种种》等等都是借古喻今。这些文章在《北京晚报》周二、周五刊登，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招来了最后的杀身之祸。邓拓的这段沉浮，似乎并没有使他和丁一岚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否则，他就不会写出《废弃“庸人政治”》这样尖锐辛辣的文字。

当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深深地钦敬邓拓的勇气和犀利。而丁一岚在1959年的遭遇，也可以使许多并不了解她的人，认识到她的刚直和执着。当人们把目光聚集到邓拓这个名字时，我觉得，我们是多么不应该忽视了丁一岚的存在。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万言书。庐山那边就传来指示，让北京的三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讨论时事问题，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倡向党交心。我那时在中央台总编室，也思考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和国家经济面临的困难。我想，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大炼钢铁是不是得

不丧失？毛主席说过，我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即使我们先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也不要宣布，我们还是推崇苏联老大哥，把他们摆在前头。这个提法对不对？毛主席常常说，小资产阶级容易头脑发热，把事情搞糟，毛主席自己是不是也有些头脑发热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在座谈会上谈出来，这些话太尖端了，在当时这么说话，实在是有点冒犯了。可是我想，经过57年反右，许多党外人士都不说话了，我16岁就到了延安，也是老党员了，这个时候我们共产党员不挺身而出讲真话，好像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我真觉得，党很想了解下面的意见和情况，我确实也是以向党交心这种心态来谈这些问题的。结果，我的发言被看作是向党进攻，说我是反党，在中央台食堂的饭厅里，贴满了对着我的大字报。这以后把我下放到“穷棒子”合作社劳动改造了一年多。

两年后，丁一岚才被调入当时的国际广播电台，重新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对于一个忠于党的革命战士来说是多么重要啊！但是，她没有想到，几年后，她将和邓拓一起，再次被贬斥出革命的阵营。

#### ◇ 孩子的困惑，“大参考”被收走

批吴晗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要批邓拓了；他保吴晗也没保住。1965年底、66年初，党内在北京范围内就批邓拓了，北京市委不能不批邓拓。因为已经在内部点了北京市委的名，说北京市委包庇反党集团。大家都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嘛，北京市委能不执行党中央的意图吗？大概在批判邓拓以后不久，北京市的领导彭真、刘仁同志就受到批评。我们也已经知道，这一场批判真正的对象是谁了。

当时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被停止了工作，他一直呆在家里期待着有一天能向党说清楚自己的创作思路、写作意图。虽然呆在家里，但他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人身自由，家里的警卫员，这时已经成了监督员了。曾经是温馨而热闹的家，变得静悄悄，父子相见，都默默无语。

我们家的孩子一直受党的教育，都非常热爱党，相信党。可报上说他们的爸爸是反党集团分子。在孩子们眼里这可是最坏的人，是最肮脏的。可他们又不愿意相信，一向那么温柔、那么爱他们的爸爸怎么会是反党分子？我又不能跟他们解释，说你们的爸爸是无辜的，我怕他们在外面这样说会惹出什么乱子。可你让我说，爸爸是反革命，我又于心不忍。每次孩子们走过爸爸的书房都踮着脚，轻轻地，轻轻地，怕碰见爸爸，不知说什么。邓拓一向非常爱孩子，他怕孩子们为难，也尽量避着孩子，装做没看见他们。只有我知道他心里有多难受，他多想像从前一样和孩子们说说话，聊聊天。

孩子们对父亲的怀疑，令邓拓心如刀割，但他理解孩子们对党对领袖的那份至高无上的忠诚。可是发生在4月的这件事，对于邓拓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丁一岚回忆说：

虽然邓拓没有工作，但新华社编的内部“大参考”还是按时送到我们家里，当时每个市领导都有一份。4月的一天，市委机关忽然来了几个人到我们家，没有跟邓拓做任何解释，就把我们家的“大参考”全部都收走了，还说以后不再送“大参考”给邓拓了。邓拓问为什么，他们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什么指示也没说。邓拓有点激动，希望今后还能看到“大参考”，来人也不理会他，拎着那些“大参考”就走。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还在说：能不能继续把“大参考”给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后，邓拓一直坐在书房里，一句话也不说。

一本“大参考”，在许多人眼里它不过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一种待遇，但处在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声浪中，邓拓把这本“大参考”当成是一种象征

，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他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挣扎着、希冀着。现在这个象征不复存在，而它透着某种更为严酷的信息。虽然邓拓没有向任何人吐露他此时的心迹，但我们可以想象，一直在家中等待转机的邓拓接受这个事实的痛苦与绝望。在承受了许多这样的打击之后，他正一步一步向绝望的深处走去，最后，他选择了死。

# ◇ 绝望的邓拓以死明志

从5月8日开始，北京各大报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深挖“三家村反党集团”幕后的人物，全国各地也在传唱一首童谣：“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可见这场批判的深入广泛。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经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在党报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对邓拓是致命的一击。邓拓觉得党彻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诚。丁一岚理解邓拓最后的选择：

说邓拓是叛徒，邓拓不能忍受，因为《人民日报》是党报，党报这样宣布，邓拓说，是不是党对我做了什么结论了。其实后来在复查时才知道这是毫无根据的，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是代表党啊。在那种情况下，压力大，因为处在了和党对立的这么一个位置上。你要让他跟敌人斗，跟国民党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斗，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坚持斗争。邓拓1930年就参加共产党了，为党做过很多地下工作，还被捕过，在监狱里跟敌人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战8年，解放战争3年，在敌后背着机器，坚持为党出报纸，敌人进行“梳篦式”扫荡，他都坚持出报。那时候经常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多少枪林弹雨他都挺过来了，因为党相信他，边区政府支持他。可现在呢，党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他对面是共产党，是他一向信仰和遵从的党组织。他还要面对那些并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所谓的革命群众，他成了人民的敌人。这跟过去战争年代的斗争完全不一样，这个他不能忍受。我觉得，一个对党非常忠诚的人，绝对不能忍受。

1966年5月18日，对丁一岚来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我们家是三间房，我和邓拓分开住，各住一间。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全身都凉了。那时候，他有很多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写东西，手出汗很多，写东西他总用一块手绢擦汗。我拿到他这个手绢，那手绢都是湿的，他当时写遗书时，心里有多么难过，就这样走了。我当时也不敢失声痛哭，家里还住着警卫员呢。邓拓临死之前，放在桌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好像稿纸，上面写着让我立即给这个东西销毁。我看见这个信封，让我马上销毁，哎呀，那时候我都不想该怎么办，又怕惊动了警卫员。那时，邓拓的姐姐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她叫起来。我说，现在有这么个东西，要马上销毁，然后，我们俩就噼里啪啦地连剪带撕地弄碎，扔到厕所，还有澡盆里，拿水冲掉了。当时不敢烧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没看看销毁的是什麼，是稿纸，那么一叠，字都朝里，我都来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卫员醒来之前，我得处理完。所以，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销毁了什麼东西，我想来想去，我帮他销毁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他遗书的底稿。你说我怎么就那么马虎，没有看一眼就销毁了呢？我一直为这件事责备自己。

这是多么凄怆、令人心碎的场面。一边是没有亲人守候的邓拓的遗体，一边是妻子和姐姐为销毁他的遗物而心惊胆颤地忙碌。丁一岚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一直是非常坚强的，她的确非常坚强，因为她必须坚强。

在通知北京市委来人之前，丁一岚有时间可以端详一下自己风雨同舟30年的丈夫。

我总觉得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个人怎么能够忍受全国几亿人的谩骂，到最后被组织上宣布是叛徒，我觉得没法活下去。所以，我也有这个想法，真是活着不如死了好。看见他那么平静地躺在那里，我跟他说：“你走吧！安安静静地走吧，你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是最好的解脱。”

这是怎样的一种生离死别呵！

北京市委已经调整了班子，由新市委代替原来的老市委领导工作，他们决定不许把邓拓去世的消息公开出去，凡是在场的人都要绝对保守秘密。邓拓死的时候，家里的孩子都不在家，连我的孩子也不让知道。第二天，他们又来我家抄东西，很客气，说按党的规定，邓拓的书信、照片、作品都拿走，邓拓的秘书和他们那儿秘书处的都来了，邓拓给我有一封遗书，是很小的一张纸，就说对不起我，他这样做也可以让我和孩子解脱了，免得我们再因为他受到什么痛苦。使我感到最难受的是，邓拓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遗书，写完了搁在枕头下面了，翻了一阵才翻出来，他们当时就拿走了，也没给我看。

邓拓去了，虽然对他和“三家村”的批判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却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所有强加在他身上的诬蔑和屈辱。他并不知道，吴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长期被监禁。

邓拓的死，并不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亲人们得到解脱，痛苦依然绞着丁一岚的心。

在文化大革命10年，我真觉得难熬得很，比抗战8年还难熬。我在我们机关里，有5年时间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绝对的孤独，绝对的寂寞。我是绝对忠实于党的决定的，所以，很长时间我没跟我的孩子说，爸爸已经死了。我对孩子绝对保密，这样的处境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孩子也不问，他们也很怕爸爸在家，怕见到爸爸。一直到两年以后，外边已经传开了，说邓拓已经死了，孩子们才回来问我，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说爸爸住院了，他们也不希望爸爸回来，怕红卫兵来家里闹，孩子们的精神负担很沉重。结果外面已经传说爸爸死了，那时候，咱们的报纸习惯说，谁谁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了，花岗岩脑袋就是顽固不化，那就是说这个人死了。孩子们从外面听说了，回来问我，我还是先请示了北京市委，我能不能跟我的孩子说邓拓已经死了，我这个人对党是绝对忠诚、非常正统的一个人。经过请示，我才敢跟孩子们说，爸爸已经死了。孩子们都非常爱党，相信党，党的报纸说爸爸是叛徒，他们再也不愿意理爸爸了。可后来，他们被人家骂成是狗崽子，他们亲身遭遇了许多的不公正，有些事情他们慢慢就清楚了。我生怕孩子们因为爸爸的死对党不满，对群众不满，再说出什么不满的话来，最后也被逮捕或怎么样，我要极力保护这些孩子。我教育他们要爱党爱群众，他们跟我说，我们爱党，但党不爱我们。这是事实，他们下乡插队多年，想去工厂、上大学都不批准，就是因为他爸爸的问题，所以，孩子们说这样的话，我总是很痛心。

最让丁一岚痛心的是，邓拓的骨灰不知道存放在哪里才最安全，放在家里肯定不行，红卫兵随时都可能来抄家批斗。最后，她和邓拓的哥哥商量，把邓拓的骨灰放在哥哥家里。邓拓的哥哥当时在中科院，邓拓的父母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哥哥家中，他们将二老的骨灰合在一个坛子里，空出来一个藏着邓拓的骨灰。从表面看，两个坛子安放的还是邓拓父母的骨灰，经过这样一番伪装之后，邓拓的骨灰才得以平安地躲过文革这场浩劫。若是邓拓父母在天有灵，得知他们死后仍能保护爱子遗骨逃过劫难，不知二老感到的是悲恸还是欣慰。

每年5月18日，丁一岚只能一个人默默地祭奠邓拓，她总是给邓拓写一封信，告诉他这一年里她和孩子们的情况，就像邓拓活着时，他们夫妻谈着的那些家常

话。她也向他倾诉自己的孤独和困惑。写这信时，她仿佛感到自己不再那么孤立无助了。然后，她划着一根火柴，把信点燃。每一年，她都按时给邓拓寄出这样一封信，她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和丈夫交流着情感，联系着两个世界。

#### ◇ 有关平反的一些事儿

每一个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1976年那个金秋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沦为人民的“阶下囚”。可是历经10年磨难、满目疮痍的中国仍然背负着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从国家主席到开国元勋，从各部委、省委，到基层干部群众，受害面之广前所未有，“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这类莫须有的罪名，依然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成千上万的人们。从1978年陆续展开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给丁一岚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希望邓拓的问题能够尽快得以复查。

那时我也不敢提这个问题，我得摸清楚情况才敢提。我遇到一个从前认识的同志，他说，《人民日报》的领导很关心邓拓的问题，你写个材料吧，我们那里有一个内部刊物送中央的，回头给你写的材料印在上面，这样，政治局的一些同志都可以看到。我后来就写了这个材料，登在那个内参上，中央就批示让组织部的专案复查小组复查，这才开始复查邓拓的问题。79年初复查时，文革时的专案组影响还很大，他们分析问题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很大，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一个一个地问题查，我就跟他们辩论。邓拓有一枚图章，上面刻着“书生习气不可无”。这句话，文革时就批判过，说邓拓是抗拒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说他是“书生办报”，他有抵触情绪，就刻了这个图章。复查的时候，那些人还追问我，这个图章是什么时候刻的，是在毛主席批评他之前、还是之后刻的，就连这样的问题都还在抠唆。哎呀，争来争去，算是给邓拓平反了。给了一个结论，很简单的几行字，写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都不是反党，所有被株连的人都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写的就这么简单。

拿到这张只有几行字的平反结论，丁一岚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看一看邓拓13年前写下的遗书。时隔13年，丁一岚才看到邓拓的那封长达6000字的遗书。在档案室里，面对着那些熟悉的苍劲有力的字迹，积郁13年的泪水，奔涌而出。

最后，他们同意我到资料室去看邓拓档案里的遗书，隔13年，我才看到遗书，这时，我真是忍不住了，在档案室里大哭了一场。邓拓的遗书写得非常动人，是写给北京市委的，整个叙述他的写作目的和他被捕的经过。他说，我的写作问题，完全是我个人负责，跟北京市委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的稿子市委并没有审查。后来为了邓拓的追悼会怎么开，也争论了很长时间。甚至追悼会的悼词他们也没有让我先看，可能怕我有意见吧。后来北京市委有一个同志跟邓拓很好，他给我看了悼词，结果他们限定这个追悼会不能超过600人，还是要处级以上干部。很多人都对这个限定有意见，我也有意见。我说，当时跟邓拓他们一起搞《三家村札记》的编辑，哪有处级干部，这些编辑后来都受株连了，受到很大的打击，现在连追悼会都不让他们参加，这对这些同志是不公正的。我自己在电台打印了一个讣告，印了一百份，寄给我们的一些朋友。开追悼会那天，很多人都去了，有1300多人，人太多了，八宝山的纪念堂里根本站不下，大部份人都站在外面。幸好把邓拓的遗像做了两个，一个摆在会场里，一个摆在外面。我想，那些站在外面的同志，那么多年没见过邓拓了，看一下遗像也好呀！

#### ◇ 丁一岚的反思

我们今天重述这些饱含血泪的往事，并不仅仅只是把它作为一段黑暗历史的见

证，而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能从昨天的历史中捕捉到一些真谛，使我们能够在现在和将来不会再重复昨天的黑暗。丁一岚的话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我觉得文革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大悲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场运动？这个问题得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毛主席在全国全党的威望非常高，到后来呢，几乎变成了神。的确，像我这样年岁的人，对毛主席非常有感情，到了解放初期，逐渐地由一种高度信仰发展成盲目尊崇他，以至于到最后是迷信他。另一方面，毛主席他自己随着威望非常高，逐渐就感觉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了，他心里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就开展文化大革命。本来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大个党，有一些矛盾，有一些理论上的争论，这都是很自然的，可以逐步解决。我怎么也想不到，毛主席最后采用自上而下地、发动全国人民搞这场斗争，这个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我觉得，我们党要很好地总结这个历史教训，绝对不能让它再发生了，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多么严重的打击呀。文革中死了多少人呀，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为党的事业战斗，那真是全力以赴呀，即使牺牲自己都无怨无悔，过去战争年代，敌人要想抓，要想杀都弄不到，结果我们自己，还有“四人帮”能把这些同志毁了。

我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它的破坏力，远超出对一个家庭或者几个家庭、或者是对一部份人的伤害。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受到的伤害真是难以估计。我觉得一定要很好地总结这个经验教训，我们倒不是说，一定是谁负责怎么怎么样，而是这个事件发生，我觉得这里头有很深刻的教训，怎么样建立起我们党内的、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怎么样能够听取更多方面的意见来解决任何一个比较大的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绝对不能再重演了！我希望，特别是党的领导同志要很好地总结这个历史教训，反思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民族悲剧。我想只有我们党从中吸取了教训，那些在文革中死了的人才没有白白地死，也还算有价值，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党贡献了生命。

采访丁一岚的那个下午，隔壁邻居家的孩子一直在弹一首莫扎特的小夜曲。在丁一岚家种满花草的阳台，有几只小鸟在夏日的阳光里蹦跳鸣叫。在鸟语花香的旁边，在明快优美的钢琴声中，听着一位老人讲述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悲剧，我很难表述我内心的那份复杂的感触。在这快乐与悲哀的交织中，我总是想到邓拓去世时手里攥着的那块湿漉漉的手绢，我想，那上面不知浸着多少男儿泪。

这次访谈的3个月后，丁一岚病逝。

□ 原载《南方周末》1999.6.25

∞ ∞ ∞ ∞ ∞ ∞ ∞ ∞ ∞ ∞  
伴君如伴虎——毛泽东是怎样把邓拓逼入绝路  
• 胡绩伟 •

◇ 本应批胡乔木，却大批邓拓

自建国以来，毛泽东一直派他的亲信胡乔木来领导人民日报，掌握整个宣传舆论战线，像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这样的重要会议，应当如何宣传，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得听胡乔木的指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不发消息？也不是人民日报能决定的。党中央早有规定，这样重大的党国大事，都只能由新华社统一发稿。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消息，只能以新华社的头头是问。人民日报虽然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它根本没有发布重要新闻的职权。至于该不该发，该早发还是晚发，该如何发，只有唯一的中央通讯社新华社才有唯一的发布权。而这，也是要听从胡乔木的指挥。没有发新闻，只能是新华社的责任，不是人民日报的责任；而新华社只能按胡乔木的指挥行事，因而应该挨批评的不应是邓拓，而应该是胡



乔木。可是这一顿乱棒为什么要打在邓拓和人民日报的头上，就令人费解了！

毛主席批评最高国务会议只发了那么简短的两句话新闻，这也不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责任。至于为什么对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人民日报为什么不按领袖讲话的精神写社论，这也不能怪邓拓，只能怪胡乔木。因为人民日报做了一个宣传计划，写了几篇文章，送给胡乔木审阅，他都压了下来。胡乔木为什么压下不发？他解释说：“因为没有把握”。这样的大事，他天天都能见到毛泽东，为什么不向毛请示？究竟胡乔木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以致招来这一场对邓拓的批评？！可惜他死了，不然也许能问出个子午卯酉来。

◇ 毛讲话常大改，谁敢先发表？

毛批评，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人民日报不报导，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为什么“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正如邓拓所解释的：“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没有公布前，也不能引用。”而毛对这些规定可能不知道，也许曾经知道过，过后就忘掉了。试想，毛在这一段时间里多次讲话，他从北方到南方，从天津到济南，到南京，到上海，每到一个地方就大讲一通。最后回到北京，又修改他原来的演讲稿，在一些大政方针方面又作了原则性的修改。试问，如果他一讲，马上就在报上透露出来，前后不一致，能行吗？因而他批评人民日报“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恐怕乔木也负不了这个责任。这个责任只能由他这位最高领袖自己来负。

毛骂人民日报“按兵不动”，我们能动吗？在毛老人家钦定的特派员胡乔木严格掌握下的人民日报，对于这些党国大事如何宣传，不经毛或胡的批准，我们敢动吗？在处理这些重大事件时，我们根本没有主动的权利。多少年的经验教训，邓拓比我们都领受得更深刻了，“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党”的利剑悬在我们头上，敢“轻举妄动”吗？

◇ 左比右好，历来如此

毛指责邓拓传达他对陈其通等四人文章的批评，说是歪曲了他的原意。其实，毛先说陈四人的文章“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然后说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是“教条主义”。当时不仅是邓拓，很多省委书记也是认为毛是在表扬陈四人的文章。因为“忠心耿耿，为国为民”是根本性的表扬。至于“教条主义”，我们党（包括毛本人）历来都认为这是左，“好心办了坏事，是一心为党”，是“左得可爱”。“左比右好”成为党内的一种传统观念，成为我们党对待干部处理轻重的根本原则。教条主义是左，是方法问题；修正主义是右，是立场问题。多年来，我们都是真反所谓的修正主义，假反所谓的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就是反革命，是三反分子；教条主义都是“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好同志。反右派斗争是这样，反右倾斗争也是这样，几十万敢于鸣放、敢于上书直言的人被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像陈其通等人却成了大左派，是受到党表扬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拓同志政治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他早就觉察到毛的真正用心，保护了一些同志，保护了人民日报，从而引起了毛泽东的恼怒。

◇ 毛蛮横批评使邓拓十分难堪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邓拓的批评，简直是“破口大骂”，这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当我走进毛的卧室，见他满屋子是书，床上的一半也是书，使我肃然起敬，觉

得毛真是一位满腹经纶的知书识理的伟人。很快，从他那样谩骂邓拓，骂他“占着茅坑不拉屎”，骂他“增加板块折旧费”，骂他“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这些粗俗的不着边际的辱骂，实在有失一个党的领袖的身份。不仅邓拓感到十分难堪，连我们几个副总编辑们也感到无地自容。

毛泽东在批评邓拓的同时，也批评我们几个副总编辑是“铁板一块”，不敢批评邓拓，“不敢革邓拓的命”，“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毛泽东还鼓励我们敢于和邓拓“争吵”、“拍桌子”，“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这些话，听起来非常刺耳，不知毛老人家是何用心。邓拓是中央任命到人民日报当总编辑，他谦虚谨慎，作风正派，勤勤恳恳，尊重同志，我们这些下级——同他合作的伙伴，自然是铁板一块般地和他团结在一起，共同办好报纸，怎么可以同他经常吵闹不休，向上级打小报告、告黑状呢？再者说，邓拓当总编辑又不是民选的，是中央任命的，中央对他不满意，党中央主席完全有权撤他的职，一句话就行了，又何必号召我们起来革邓拓的命？更何况在我们这些下级人员的心目中，邓拓是正确的，他没有错，是你毛泽东批评错了！由此想到在邓拓调离报社后，他写了一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诗中的一句：“风雨同舟战友贤”，正说明人民日报领导班子和邓拓同志是十分团结的。毛泽东想以我们之口为凭据来撤掉邓拓，这个算盘是打错了。

毛泽东骂邓拓“辞职”是假的，说他：“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这点骂得最不得人心。邓拓的生活简朴，艰苦奋斗一生，在报社同志中是有口皆碑的。在战争中，他的腰受了伤，未得到很好的治疗，形成腰疼的痼疾，不能弯腰伏案写作。他的背上穿了一副钢背心，日日夜夜都是挺直地坐着。他写稿、改稿、编稿都向后挺直的斜靠在床上，背后放一个帆布的马架子当靠背。每次看到他在这种姿态下写作，敬佩钦慕之情油然而生。他不知得了什么病，一天到晚不停地出汗，不停地用毛巾擦汗。报社的同志都十分尊敬他，都为他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他的威信很高，报社从上到下都尊称他为“老邓”，根本不叫什么“长”、什么“总”，一律称之“老邓”。

当年，报社同志听说毛主席批评邓拓“养尊处优”，都难以接受，认为这点同邓拓同志根本沾不上边。至于说“汽车进汽车出”，像他这样一位行政七级的部长级老干部，哪一个不是配有专车呢？毛骂邓拓“占着茅坑不拉屎”，参加中央会议后不发消息，不写社论，只能“增加板块的折旧费”，甚至说：“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说老实话，毛泽东本人一进北京就住进皇帝的御用禁苑中南海，这不是帝王思想的反映是什么？

#### ◇ 胡乔木的角色令人费解

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为什么出八个版”，实际上就是批评大改版，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出八个版，不只是在形式上从四个版改出八个版，报纸增加了一倍的篇幅，而是为了从内容上进行一番大改革，使报纸从内容到形式都焕然一新。事后我才知道，当报纸改版的试刊样报送给他时，他并不满意。现在如此批评出八个版，批评我们呕心沥血所进行的大改版，实在使我大失所望。可见，虽然大改版是党中央正式批准了的，毛本人还是坚持不同意的立场。令人难以想像的是毛泽东那种蛮横无理的态度，把自己以前对这件大事的同意，竟然说成“那是我说了昏话”，并说：“我的很多话你们都听不进去，这件事就听进去了！”这简直是当面赖帐了。问题是：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大改版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是一九五六年六月同意过，到一九五七年四月又表示不同意了！胡乔木传达说毛主席同意改版，传的是真经，还是假传圣旨？从人民日报的领导班子来说，大改版前有给中央的正式报告，有胡乔木的口头传达，又有中央的正式批文及转发给各省的中央文件，怎么前后不到一年，竟然成为邓拓被毛老人家大骂一顿的罪状了呢？

对毛泽东如此大骂邓拓的闹剧，我在很长时期内都存在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他为什么不骂胡乔木而骂邓拓？直接负责这项罪过的首犯应当是胡乔木，不是邓拓。再说，胡乔木在毛的身边朝夕相处，毛要骂邓拓，毛不可能不先向乔木透风，乔木事先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如果乔木真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好汉，他应当事先向毛承认，人民日报之所以“按兵不动”，是他压下了报社的宣传计划和所写的文章，是他自己“没有把握”，而又没有或者不敢向毛请示。如果是这样，毛怎么可能这样没头没脑、张冠李戴地把报社编委会成员叫来大骂邓拓一顿呢？我甚至怀疑，胡乔木可能不仅没有把“按兵不动”的原因和直接责任者事先告诉毛，而且，乔木在背后向毛说了邓拓多少坏话，使毛逐渐装满了对邓拓的一肚子火气，按捺不住才公然宣泻出来，以致到了这样横蛮无理的地步。

#### ◇ 新闻专制主义乃传家宝

还值得说一说，在这次“床前训话”中，毛已经表示同意的两件事，以后并没有兑现：一是关于“政治局委员办报”。我向毛提出这个问题时，得到了他的认可。他说“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是须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得住。”而且，在谈话结束前作结论时，还特别提出“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这件事以后并没有解决。因为如果真正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来“坐镇”，来“顶得住”，这就不只是顶住树大招来的风，很可能连毛的瞎指挥风也给顶住了。这一点，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因而他继续指派他的秘书胡乔木到人民日报来“指挥”，会更得心应手些。

另一件事，是毛承认的“人民日报应当自己写新闻”。这不是写什么一般性的新闻，而是重大事件的新闻，也就是人民日报要对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独家新闻，改变新华社一家垄断重大新闻发布权的现有体制。文革以后，我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曾经再一次向中央提出这个问题，要求中央批准人民日报派出一个“中南海采访组”，争取也有发布中央重大新闻的权利。因为受到胡乔木的反对，没有办成。在文革中，人民日报派驻各省市的记者组和新华社各省市分社合并的事也吹了。文革后，两家记者形成竞争，这本来是好事，可是新华社某些领导同志不同意，以致提出“新华社办报”的问题，我举双手赞成。如果新华社也办一张全国性的报纸，就打破了中央党报只此一家的框框。这样，人民日报也可以办一家全国性的通讯社，也打破中央通讯社只此一家的框框，我认为这正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一个大改革。可惜，我这个意见被胡乔木认为是“离经叛道”。他不赞成，自然，就难于列入中央考虑之列了。党中央只能有一张中央党报，只能有一家中央通讯社的新闻专制主义传统，还是被当作传家宝，一直传到了今天。

#### ◇ 邓拓不执行毛的阴谋故而遭忌

四月十日的“床前训话”，已经是毫不掩饰地再二再三地逼着邓拓辞职下台。可见，毛泽东早就对邓拓忌恨在心，必欲除之为快了。

五月一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庆祝“五一”节的焰火晚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把我叫到城楼边上人少的地方，对我说，中央已经决定调换邓拓，问我愿不愿接替邓拓的工作。我当即坚决地表示，我才疏学浅，难于担当如此重任。这表明中央正在考虑新的人民日报总编辑。

据当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的回忆，六月一日，毛泽东亲自约吴谈话，对他说，找你来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吴答以自己理论水平不高，表示“不适宜到人民日报去”。毛最后说，给你十天考虑时间。六月十三日，毛又找吴谈话，说：“中央已决定你去人民日报，今天就

去，先去帮助乔木工作一段时间，中央再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

在邓拓任总编辑时，人民日报社实行的是“总编辑制”，总编辑是报社各项工作的最高领导人，现在改为“社长制”，社长是最高领导人。实际上毛泽东对邓拓是明升暗降，报社的一切大权从此都掌握在总编辑吴冷西手中。

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政策，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了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毛批评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鸣放”得好。记得邓拓曾经对我说过：“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人民日报》不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鸣放，学了要出乱子。”邓拓说：“《人民日报》如果也像那样的鸣放，也被打成右派报纸，党中央也会陷于被动，人民日报社内部又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右派分子。”以后事实证明，《光明日报》、《文汇报》都被打成“右派”报纸，两家报社的总编辑都成了大右派。因“鸣放”得好而又受到毛泽东赞扬的《中国青年报》，四个正副总编辑，三个当了右派，一个被撤职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中青报的领导班子几乎全军覆没了。可见，毛主席批评说：“人民日报按兵不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面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看起来邓拓早就看出有一个“引蛇出洞”的“鬼”，有个能把“阴谋”说成是“阳谋”的鬼，这个鬼就在毛泽东自己的心里。

在毛老人家大搞阳谋的情况下，邓拓当然不是“善解人意的人”。吴冷西来了以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他都列席。邓拓明升暗降，处境十分艰难。这时，邓拓分管社论、理论和文艺宣传。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的那篇反冒进社论，批评“右倾保守”准备发动“大跃进”。他批评这篇社论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说：“一九五六年，经济文化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经济的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冷水。”这次会上，毛泽东又不点名的批评了邓拓。

一九五七年底，在十二月二十日的编委会上，胡乔木专门批评了思想、理论的宣传问题。他说：毛主席批评《人民日报》时说过，《人民日报》不是第一流的报纸，是第二流的报纸。因为它不谈理论，不谈思想。在讨论什么问题时，要经常记住辩证法，历史唯物论，要讲阶级，讲矛盾，分析矛盾性质，这就叫有理论。但人民日报这么多人写文章却很少谈这些。

#### ◇ 邓拓终于被迫辞职

紧接着，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旧事重提，以尖刻的语言，当着所有的与会者的面，在大庭广众之下，再次批评邓拓。当邓拓走进会场时，毛泽东说：“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七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我给你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有一句名言‘千金难买好时机’，‘寸金难买寸光阴’。大鸣大放，清华大学叛变了几个支部，不然审也审不出这些叛变分子。邓拓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他是死人办报。”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批评了两年前那篇反冒进社论。他认为这篇社论有原则性错误。他说：“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在‘但是’以后，是反马列

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虽有君子，然亦有小人。’这是魏忠贤的笔法，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一来不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卖马，掐头去尾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

上述这些讲话，逼迫邓拓只能又一次辞职。到这年八月，中央才批准他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职务，到北京市委当文教书记。到一九五九年二月，报社专门举行了一个正式的欢送会，这是编辑部全体人员参加的一次盛大集会。他在会上心情激动，朗读了他那首著名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七言律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二日

这首诗，令我终生难忘。离开这样的好领导、好师长、好战友，我感到困惑和茫然。我反覆琢磨，他那句“文章满纸书生累”的“累”字，很可能最先是“泪”字，可作“滴滴血泪”来解释，以后才改为“累”字。

#### ◇ 临别交心，文革玉碎

在他离开报社以前，他曾约我到京郊潭柘寺去转悠了一次。在那曲曲弯弯的山道上，在那幽深寂静的寺院里，我们两人怀着沉重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伐，边走边谈，有时就在石头上坐下来谈。当时，一来我的思想觉悟不高，二来是他很严格地吐词遣句，总不指名道姓，不能对我敞开胸怀，畅所欲言。我当时比较天真幼稚，更缺乏党内斗争经验，的确不能充份理解他的心情。现在想来，真恨我当时不是他的知音。那时，我还是一再劝他不要辞去报社的社长职务，甚至劝他要作一些斗争。他连连说：“难呀，难呀！”

可惜，我在一九八六年写的纪念他逝世二十周年的文章时，是这样写的：“他长长地叹了几口气说：‘如果允许的话，我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对他的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而未敢公之于众。时间又过去十二年了，我应当把他那句感慨颇深的话写出来，他说：“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多少年来，我多次想过他的这句话，我自己虽然没有被迫产生过“落发为僧”的念头，但我多次深感我们这个自翊为民主的党，党员既没有退党的自由（要退就得作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党），也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

一九九二年，我写了一篇《报生涯五十年》的自述，其中谈到了邓拓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就被迫自杀的事。我写道：“我的战友和师长邓拓同志在这场风暴中首先倒下。他像玉石一样地‘碎’了，而我，却如‘瓦’一般地活着。”

这是中国最优秀一代知识分子的悲惨下场。但是，他们所创下的杰出的业绩却永世长存。邓拓所领导进行的一九五六年的人民日报大改版，是我国新闻史上极为宝贵的一页，它将继续光耀人间，邓拓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对于邓拓之所以遭受到毛泽东那样辱骂和忌恨，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我将在

下一章来加以回忆。

□ 一九九八年七月写于北戴河，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二次修改

本期编辑：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